

学校编号：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9902017

UDC \_\_\_\_\_

## 学 位 论 文

东晋南朝钱币私铸与剪凿问题初探

高 燕

指导教师：陈明光 教授

申请学位级别：硕 士

专业名称：专 门 史

论文提交日期：2002 年 7 月

论文答辩日期：2002 年 7 月

学位授予单位：厦 门 大 学

学位授予日期：2002 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 车发松教授

评 阅 人 \_\_\_\_\_

2002 年 7 月

## 论文摘要

钱币私铸与剪凿是长期困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的货币问题，但各个时代发生的原因并不是雷同的，必定受各自时代的影响而体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本文以东晋南朝钱币私铸与剪凿问题为研究对象，全面探讨这一货币问题的来龙去脉。认为：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通货需求不断增长，而当时主要通货只有铜钱一种，其他诸如谷、布、绢或者金银、铁钱等的货币功能都相当有限，构不成主要通货。这样，通货需求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就是铜钱需求的不断增长。而由于种种原因，历朝政府却在如何增加通货供应的措置上出现严重失误，致使官方铸行的法币长期不能满足市场流通，从而给钱币私铸与剪凿的长期存在留下了一定的合理空间。钱币私铸与剪凿尤如一把双刃剑，虽然一肆泛滥就会扰乱正常的市场流通及其它社会秩序，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官方法币铸行不足而导致的通货不足。

全文四万七千余字，共分五大部分：

前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与选题意义，对本课题的学术史进行回顾，说明所运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东晋南朝的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依据东晋南朝相关文献记载，本文指出，私铸钱币与剪凿古钱的现象几乎贯穿于整个东晋南朝时期。除了萧梁时短期内的铁钱私铸外，长期以来是铜钱的私铸与剪凿。它们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当时的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封建政府虽然对之加以严刑惩罚，但仍是屡禁不止；有时试图对之加以宽容利用，收到的效果却更糟。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通货需求的增长。本部分旨在探讨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商品货币经济背景。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有日渐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作基础，又有日益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到商队伍中来，加之水运便利，商业都会大量出现，种种因素促使江南商品经济呈现出有史以来最活跃的局面。这促使国家财政收支结构趋向货币化，并且会进一步刺激人们把更多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换，使社会经济发展愈来愈依赖市场和货币，由此产生日益增长的通货需求。本文通过分析指出，当时主要通货只有铜钱一种，其他诸如谷、布、绢或者金银、铁钱等的货币功能都相当有限，构不成主要通货。这样，通货需求量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就是铜钱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官方货币政策与私铸、剪凿钱的长期流通。在前部分探讨的基础上，本部分着重分析了东晋南朝时期官方货币政策演变和市场流通中钱币使用状况。指出：一方面，由于政府如何在增加通货供应的措置上出现严重失误，官方铸行的法币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减重，并且长期不能满足商品交换需要；另一方面，受“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支配和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多数好钱或被销毁改铸，或被聚敛贮藏而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所以导致新旧钱长期并行流通，且以旧钱流通为主。这些旧钱有相当部分又是各色私铸、剪凿钱。钱币私铸与剪凿虽然屡遭政府禁断，但收效甚微。它们实际上长期活跃在流通领域。

私铸与剪凿的综合分析。在前文论述基础上，本部分对有关钱币私铸与剪凿的三个主要问题做更深入的综合分析：其一，市场能够接受私铸、剪凿钱的理论分析；其二，私铸与剪凿钱常常泛滥于官铸法币后不久的分析；其三，对参与私铸与剪凿的社会阶层的分析

关键词：东晋南朝 商品经济 私铸 剪凿 通货

# 目 录

前言	(1)
一 东晋南朝的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	(4)
二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通货需求的增长	(7)
(一) 江南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7)
(二) 通货需求的增长	(11)
(三) 主要通货分析	(12)
(1) 从流通手段职能判断, 铜钱是主要通货	(12)
(2) 其它货币形态构不成主要通货	(13)
“钱帛兼行”析	(13)
金银通货析	(19)
铁钱通货析	(19)
三 官方货币政策与私铸、剪凿钱的长期流通	(21)
四 私铸与剪凿的综合分析	(41)
(一) 市场能够接受私铸、剪凿钱的理论分析	(41)
(二) 私铸与剪凿钱常常泛滥于官铸法币后不久的分析	(43)
(三) 对参与私铸与剪凿的社会阶层的分析	(45)
参考文献	(49)

## 一 前 言

通过研读古文献资料和有关货币问题的专著、文章，笔者发现：东晋南朝时期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相当频繁，且对历代政府货币政策和货币流通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官方对待这一货币问题的政策，无论是通常情况下的严刑禁止，还是在极少数情况下的试图加以宽容利用，都同样归于失败。那么，这一货币问题到底对东晋南朝社会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通常情况下封建政府会对之加以严刑禁止，却屡禁不止？为什么有时候又试图对之加以宽容利用，也同样归于失败？这些问题引起我浓厚的研究兴趣。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专门论述东晋南朝钱币私铸与剪凿的文章，遂决定对这些问题做尝试性探讨。

笔者认为，本文探讨的钱币私铸与剪凿主要影响了当时的流通领域，所以主要以货币流通手段职能和价值尺度职能为切入点，围绕这一货币问题，从与之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通货形态，和历代政府的货币政策等。

虽然，迄今为止，这一货币问题的研究尚未有专论问世，但凡是探讨当时货币问题的专著或文章都会触及到这个问题，对它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当时货币流通的影响都有或多或少的论述，有些学者甚至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尽管各家观点有异，但有个总的观点比较一致，那就是：东晋南朝时期是货币经济较为混乱的时期，货币问题层出不穷。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大多归因于国家所铸法币远远不能满足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使这一问题愈演愈烈的，则矛头均指向政府屡禁不止的钱币私铸与剪凿。<sup>①</sup>不过，这一逻辑推理是经不起深究的：既然钱币私铸与剪凿有很多负面影响，当时为何不干脆废钱不用而代之以其它货币形式呢？为何这一现象会长期存在呢？

对这一货币问题有所触及的，解放前除了何兹全于 1945 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的《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有关研究并不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学界对货币问题的研究很少。进入八、九十年代，虽然随着经济史的研究受到重视而渐多，但钱币的私铸与剪凿研究仍属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且大多只是触及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有的谈及发生的原因，有的谈及私铸与剪凿的方式，还有的谈及这一货币问题对当时流通领域的影响，等等。

其中，对于钱币私铸与剪凿问题产生的原因，吕思勉虽然只用几句话一带而过，总结的却是比较全面的<sup>②</sup>；吴刚对引发私铸与剪凿的深刻社会原因也作了较详细的研究<sup>③</sup>，此外彭信威<sup>④</sup>、郡司勇夫<sup>⑤</sup>、董国新<sup>⑥</sup>等也曾经在铸造技术等方面做了考察。

---

<sup>①</sup> 参见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66—571页；孔毅：《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第67—72页；薛平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第19—21页。

<sup>②</sup>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03页。

<sup>③</sup> 吴刚：《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学术月刊》1990年第5期，第45—51页。

<sup>④</sup>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序言第9—10页。

<sup>⑤</sup> 郡司勇夫：《中国私铸钱之我见》，良驹译，《中国钱币》1994年第3期，第56—57页。

<sup>⑥</sup> 董国新：《南朝刘宋货币探析》，《中国钱币》1997年第2期，第77页。

对于私铸者从事私铸与剪凿的方式，高汉铭<sup>①</sup>、吴刚<sup>②</sup>、李若愚<sup>③</sup>等均进行了分析，对本文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私铸与剪凿问题对当时流通领域的影响，除了前文提到的一般否定看法外，有的学者也提出了比较肯定的看法。有代表性的是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序言中谈及的，但他讲的只是一种普遍情况，至于东晋南朝的具体情况如何，限于文章结构，他没有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阐发。其他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同样如此。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钱币私铸与剪凿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关注，有些前辈时贤还对这一货币问题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受各自文章结构的影响，均未能对它们的来龙去脉进行全面、综合的阐述。本文就此着墨，试图对这一货币问题做出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

除借鉴吸收了以上研究成果外，在文章的布局谋篇上，本文也尽可能多的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由于篇目过多，此处难于一一列举，本文将在相关章节中介绍。

此外，有几篇日本学者的重要文章，比如：冈崎文夫的《南朝的钱货问题》<sup>④</sup>，稻叶弘高的《关于梁代通货的备忘录》<sup>⑤</sup>，高桥彻的

---

<sup>①</sup> 高汉铭：《简明古钱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162页。

<sup>②</sup> 吴刚：《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学术月刊》1990年第5期，第45—51页。

<sup>③</sup> 李若愚：《铜钱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6—94页。

<sup>④</sup> 冈崎文夫：《南朝的钱货问题》，《中国学》64，1932，转引自（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田人隆等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sup>⑤</sup> 稻叶弘高：《关于梁代通货的备忘录》，《集刊东洋学》31，1974，转引自（日）

《六朝时代的货币》<sup>①</sup>，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未能查阅到。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经济学理论为主要指导理论，同时借鉴了考古学、钱币学的某些理论和研究成果。在对古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全面分析长期存在于东晋南朝流通领域的钱币私铸与剪凿的来龙去脉。试图对这一货币问题作出比较合理的、全面的阐释。但由于资料的零散、残缺和本人理论修养的肤浅，本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补充与理论探讨。

### 一 东晋南朝的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

有个问题可能尚未引起注意：以往学界似乎只是对钱币私铸比较重视，对钱币剪凿多是放在有关私铸问题中顺便讨论，使人觉得似乎剪凿属于私铸行为之一。其实这是概念上的模糊。

通过研读古文献资料和其他有关货币问题的专著、文章，笔者认为：所谓私铸，是相对于官方铸行法币而言的、一切不被官方明文认可的民间铸钱行为。在史籍记载中，私铸有时被称为“盗铸”。而剪凿是与私铸有着密切联系却又不同于私铸的另一种行为：由于铜钱在长期流通中会受到自然磨损，并且经长久天然氧化，会生绿色铜锈。但受到磨损后的古钱却还能按原值流通或按一定比价流通。这给人以

---

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田人隆等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

<sup>①</sup> 高桥彻：《六朝时代的货币》，《史潮》90，1965，转引自（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田人隆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启示，于是就有人把一些形制完好的古钱或者当局铸行的法币拿来剪凿。一般是模仿磨损的古钱的样子，剪去或者磨去完好钱币原来的轮郭，有的甚至连同部分钱肉一并剪去。<sup>①</sup>被剪去或磨去的铜屑、钱肉多被重新熔铸轻小劣钱，即时人所谓“剪凿取铜”。剪凿后的古钱剪口经磨鑿后再被涂上绿色颜料，看上去仍然很象经长久天然氧化后生绿色铜锈的古钱。这样的钱拿古五铢钱来说叫作磨郭五铢、剪边五铢。<sup>②</sup>私铸者再把它们投入流通。更有甚者，会把完好古钱用利刃圆凿切割，将之一分为二。拿古五铢钱来说，内为剪边五铢，更轻小者就是所谓鹅眼钱、鸡目钱，外即为縋环钱。

东晋南朝是中国古代货币流通较为混乱的一个时期。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在史书中屡有反映。

东晋时期，“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通用。”<sup>③</sup>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孙氏旧钱，政府没有铸行新的法币。且不说这孙氏旧钱本身就包括从前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私铸与剪凿钱<sup>①</sup>，就是在当时，吴兴沈充也私铸了小钱，谓之沈郎钱。不仅为交易者所接纳，而且购买力似乎还不低。史称：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

<sup>①</sup> 拿在东晋南朝时期行用最多的古五铢钱而言，一般来说，被磨五铢大约要减重三分之一，即1克上下。参见高汉铭：《简明古钱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sup>②</sup> 因被剪切后的钱文往往只剩半边，又称对文五铢。剪边五铢重约1.5克上下，大小不等，周边不整。参见高汉铭：《简明古钱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sup>③</sup>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不多，由是稍贵。<sup>②</sup>

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8年）十月戊午，文帝“立钱署，铸四铢钱。”<sup>③</sup>新制出台，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sup>④</sup>但这种好形势未能维持，私铸、剪凿现象随之而起。正如《宋书》另一处所载：“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剪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sup>⑤</sup>

元嘉二十四年，大概剪凿现象更加严重，所以“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剪凿，”<sup>⑥</sup>朝廷就此展开讨论时，中领军沈演之也谈到这一现象的严重性，指出：

……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剪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弊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虚，譬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供贍。<sup>⑦</sup>

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尚书右丞徐爰针对当时钱币“年历既远，丧乱屡经，湮灭剪毁，日月销减”而导致的“货薄民贫，公私俱困”的状况，建议“收铜缮铸”。<sup>①</sup>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史载：

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第四部分还有详细分析。

<sup>②</sup>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sup>③</sup> 《宋书》卷五《文帝纪》。

<sup>④</sup> 《宋书》卷七五《颜峻传》。

<sup>⑤</sup>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sup>⑥</sup>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sup>⑦</sup>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民人患苦之。<sup>②</sup>

针对当时私铸、剪凿盛行的现象，始兴郡公沈庆之甚至建议朝廷：“宜听民铸钱，……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剪凿。”<sup>③</sup>大明年间（公元457—465年），私铸现象也颇为严重。<sup>④</sup>

前废帝即位，史载：

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鑿，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縲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sup>⑤</sup>

南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觐上书反映：“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sup>⑥</sup>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竟陵王萧子良上表反映当时“钱贵物贱，殆欲兼倍”的情形时谈到：“东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sup>⑦</sup>

萧梁建国之初，就出现了私铸现象<sup>①</sup>，到了普通年间，政府“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公元

---

<sup>①</sup> 《宋书》卷七五《严峻传》。

<sup>②</sup> 《宋书》卷七五《严峻传》。

<sup>③</sup> 《宋书》卷七五《严峻传》。

<sup>④</sup> 参见本文第五部分有关引文。

<sup>⑤</sup> 《宋书》卷七五《严峻传》。

<sup>⑥</sup> 《南齐书》卷三七《刘俊传》。

<sup>⑦</sup> 《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

535—546 年) 已后, 所在铁钱, 遂如丘山, 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 不复计数, 而唯论贯。”<sup>②</sup>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 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 于时人杂用, 其价同, 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钱, 又间以锡铁, 兼以粟帛为货。”<sup>③</sup>

通过以上记述, 我们看到: 私铸与剪凿钱币现象几乎贯穿整个东晋南朝。除了萧梁时短期内的铁钱私铸, 长期以来是铜钱的私铸与剪凿。它们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当时的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政府虽然对之加以死刑惩罚, 但仍是屡禁不止; 有时试图对之加以宽容利用, 收到的效果却更糟。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通货需求的增长

#### (一) 江南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众所周知“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伴侣”。<sup>④</sup>研究任何货币问题, 都不能脱离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状况。所以, 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东晋南朝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状况。总的来说, 学界关于此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近乎对立的观点: 一方认为商品货币经济是相当衰退的; 另一方则认为还是比较发达的。持前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傅筑

---

<sup>①</sup> 参见本文第五部分有关引文。

<sup>②</sup>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sup>③</sup>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sup>④</sup>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版, 第229页。

夫、孔毅等为代表。而持后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以何兹全、萧清等为代表。

傅筑夫先生认为：“就古代货币经济的全部发展过程来看，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货币经济的一个极度衰落时期，这个衰落过程并不是从这时开始，而是前一时期衰落过程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它与商品经济一起，衰落到若有若无的地步，……江南货币经济的不发达，与北朝大致相同，但造成的原因则极不相同。”<sup>①</sup>“江南各朝名义上并没有废止铜钱，但初则由于钱缺，不敷使用，继又由于钱质滥恶，良币又少，不足以善尽货币应有的职能，所以布帛谷粟便自然而然地取代了金属货币，不管铜钱在法律上是否被废止。”<sup>②</sup>他这一观点是东晋南朝商品货币经济衰退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但是，随着近年来对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和货币问题研究的深入，这一观点已受到多方质疑。

孔毅则指出，近年来有人对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主要指金属货币经济）给予了过高估计，认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都是不发达的。究其实是实物货币经济时期（当然，她主要指的是东晋南朝时期），并对其产生原因和使用情况做了分析。她认为，由于受战乱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影响，商品经济并未获得飞跃发展，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无论是大地主的田园别墅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基本都与商品经济无缘，与市场联系中断。少

---

<sup>①</sup>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卷，第402、407页。

<sup>②</sup>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卷，第410页。

量的商品交易又多半限于畸形发展的大城市，所交换商品又多是贵族的奢侈享乐品。至于民间交易则以谷帛布粟等实物为主，这种情况在农村尤为突出。它反映了魏晋以来市场的萎缩和商品经济的凋敝。商品经济凋敝和市场萎缩的必然后果便是货币经济衰落。<sup>①</sup>

笔者认为她的分析有失片面。众所周知，比之当时北方战乱，东晋南朝大多时期是相对安定的，即使有，也以地方性的居多。所以战乱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否对商品货币经济有足够的负面影响，本身就是一个疑问。更何况有时它们对商品货币经济还会有畸形促进作用。

何兹全先生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的开篇就谈到：

自东汉末到唐中叶，社会经济情况既异于前此的秦汉，亦与后此的宋元不同，交换经济的衰歇，及农村自给经济的优势，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特征之一。但此点实以北方中原地带为对象而论，若以长江流域而言，则不能不承认其交换经济及钱币使用的发达。<sup>②</sup>

他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东汉末年董卓之乱，还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都未对南方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倒是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北方人口、财富及生产技术大量南移，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南方经济逐渐繁荣，南方的交换经济更是继续发展。与交换经济发展相适

---

<sup>①</sup> 孔毅：《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3 年第 2 期，第 67—72 页。

<sup>②</sup> 何兹全：《东晋南朝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46 页。

应的，便是钱币的使用。<sup>①</sup>

彭信威先生与何兹全先生的观点相似。他指出：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变时期。渡江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是在北方，南方的生产比较落后，许多地方不用货币。南渡以后，经济和文化的重心移到南方来了，钱币的流通，大为推广。<sup>②</sup>

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史》是一部在我国比较有影响的简明中国古代货币史。他在该书中的观点同何兹全先生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认为：

货币经济在国内某些地区，主要是晋室东迁后经济已发展起来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是相当发达的。……在金属货币流通方面，在南方六朝地区，金属铸币在流通界仍居主要地位。

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

可是，由于魏晋以来在租税方面以征收实物（绢、绵）的户调代替了汉代的算赋和口赋，使金属铸币流通的范围缩小了；……晋室南迁，以迄南朝各代，谷帛的使用仍很普遍。<sup>①</sup>

笔者认为，他把晋氏东迁后的情况与汉代比较，本身就忽视了二者所辖地域的不同和晋氏东迁后江南二百多年商品货币经济的动态变化。加之单单以租税征收方面来论述它如何影响了当时金属铸币的流通，也令人难以信服。

---

<sup>①</sup> 何兹全：《东晋南朝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146页。

<sup>②</sup>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6页。

所以，本文赞同何兹全和彭信威先生的观点，即：东晋南朝的社会经济在中国自公元四世纪初至六世纪末整体处于大混乱的局面下，可谓一枝独秀。它的发展速度和拥有的水平，较之前代江南，有着质的飞跃，应该得到相当肯定的评价。

概括地说，江南江河、湖泊、丘陵纵横交错，不象北方那样一马平川。这样的地形，固然有其不利因素。但在战乱不已的分裂时期，山河险阻对一些经济区会形成有效保护，使之免受北方那种兵燹万里扫荡的灾难。常常是此处兵刃相接，彼处却相安无事；这儿易子而食，那儿却喜庆丰收。原因常常正是一条河、一道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正因为如此，在战乱不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地理形势显示出其优越性，使之在当时南北对峙时期是相对安定的，因此开始吸引大批北人南迁。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劳动力的增加，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由此江南社会经济开始了有史以来的迅速发展。

经过东晋近百年开发，到刘宋时，已是“从江以南，千斛为货”<sup>②</sup>了。如果说江南日益兴盛的农业生产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足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sup>③</sup>，蓬勃兴起的江南官私手工业，则为商品经济

---

<sup>①</sup>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147、165页。

<sup>②</sup> 《宋书》卷八二《周朗传》。

<sup>③</sup>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业实际上呈现以地主庄园经济为主的特点，有的学者（如前揭傅筑夫，孔毅等）根据一些史料，断章取义，认为地主庄园经济有着严重的自给自足性，并以此为据论证东晋南朝自然经济的强盛和商品经济的衰落。有的学者则通过对有关地主庄园经济史料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认为地主庄园经济生产除了自给自足外，与市场的联系也比较紧密，因此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参见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中“东晋南朝时期的士族庄园制度”部分，山东大学出版社，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